

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湖北省经济学界1978年专题讨论会论文集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湖北省经济学界1978年专题讨论会论文集

湖北省经济学会论文编辑组编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孝感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30,000字

1978年12月第1版 197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

统一书号: 4106·228 定价: 0.11元

编 者 的 话

英明领袖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这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的行动纲领。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一样，决心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华主席指出：“为了彻底揭露‘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必须深入批判他们那条路线的反动理论基础。”我省经济学界广大理论工作者，热烈响应华主席的伟大号召，积极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面深入揭发和批判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路线。今年三月，由湖北省经济学会主持，召开了一次关于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关系问题的专题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中共湖北省委党校、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武汉地区大专院校和武钢、鄂钢、武重等工矿企业的三十多位专业和业余理论工作者。讨论会上，大家首先对林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散布的种种反动谬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讨论会还理论联系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讨论会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力求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经过讨论，

有不少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也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为了澄清林彪、“四人帮”在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这个问题上造成的混乱，为了反映我省经济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成果，推动这一讨论进一步深入展开，使经济科学更好地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我们将讨论会上的发言稿选了四篇，经作者修改后，编辑成这个集子出版。

湖北省经济学会论文编辑组

一九七八年十月

目 录

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批判“四人帮”鼓吹政治决定经济、
政治脱离经济等谬论

.....湖北财经学院政治系 刘兴邦(1)

经济是基础与政治占首位

——批判“四人帮”在政治与经济关系问题上的谬论

.....华中师范学院 李振方(15)

怎样正确理解“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

——兼批“四人帮”对列宁这个著名观点的歪曲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方 涛(20)

浅谈社会主义企业以生产为中心

和以阶级斗争为纲

.....鄂城钢铁厂 刘德安(36)

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分析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批判“四人帮”鼓吹政治决定经济、
政治脱离经济等谬论

湖北财经学院政治系 刘兴邦

林彪、“四人帮”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肆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散布了大量的修正主义谬论。他们用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对待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鼓吹政治决定经济、政治脱离经济、政治不为经济服务等谬论，颠倒是非，制造混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极大地压抑和束缚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鼓吹的反动谬论，拨乱反正，把他们弄颠倒了的是非纠正过来，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

经济决定政治，不是政治决定经济

马列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政治与经济

的辩证关系中，只能是经济决定政治而不是政治决定经济。首先，因为政治是经济产生的，政治来源于经济，没有经济就没有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如果没有经济就无从集中，就没有政治。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37页）其次，有什么样的经济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发展变革总是政治发展变革的终极原因，政治变化要从经济发展去说明，经济状况变更了，政治或迟或早要随之相应变更。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3页）比如，封建制的经济关系，产生封建的特权思想，并要求建立以王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则产生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并要求建立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封建的政治制度被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代替，这一变更的根源在于经济关系的变革。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信中指出：“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8页）再次，阶级与阶级斗争根源于经济。政治也就是各阶级之间基于经济利益的阶级斗争。可以看出，在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中，只能是经济决定政治，而不是政治决定经济，这是马列主义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

林彪、“四人帮”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竭力鼓吹政治的上层建筑是本原的，是决定经济的。这是一百多年前早被恩格斯批臭了的暴力论的翻版。这和杜林曾叫嚷的“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寻找，而不应先从间接的

经济力量中寻找”的谬论是一脉相承的。“四人帮”及其御用工具在一些文章中写道：“人们在生产和交换中的相互关系，是阶级与阶级的关系的反映，是与上层建筑、特别是与人们的思想分不开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总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形成和发展的。”按照他们的说法，“阶级与阶级的关系”不是产生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倒成了阶级关系的产物（反映）。值得注意的是，“四人帮”及其御用工具在这里只讲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分不开”，只字不提上层建筑更是和生产关系分不开。很明显，这就是说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他们在有的文章中，更是明显地说什么“政治决定经济”，决定经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终于引起了城乡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可是，掌握政权的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凭靠他们的政治权力决定当时的社会经济不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吗？能够决定人类社会不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封建生产关系吗？同样，在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寄生腐朽、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产阶级能够凭靠他们掌握的政治权力，决定人类社会经济不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吗？显然，“四人帮”这种说法是公然地颠倒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马列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发展的性质和方向，归根到底只能是由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来决定，决不是由政治上层建筑来决定的。

“四人帮”还胡说什么，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无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才能建立一样，“封建社会里面不能

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是肆意歪曲历史事实的胡言乱语。历史事实是，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最初的资本主义关系是在简单商品生产者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早在十四世纪，资本主义关系就已在欧洲萌芽。十五世纪末叶的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后继此而来的新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对于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资本主义就在封建社会里相当普遍地产生和发展起来了。这时，政权还在封建统治阶级手里。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在英国是十七世纪，在法国是十八世纪。所以，和“四人帮”的胡言乱语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产生的。“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公然篡改历史事实。这也说明，他们的“理论”观点是非常混乱的。既然政治决定经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那就是说，在封建社会里，由于政权掌握在封建统治阶级手里，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凭靠这种权力决定当时封建社会经济不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当然在封建社会里面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么，新的资产阶级政权又从何产生？资产阶级根据什么要夺取政权，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封建生产关系呢？

我们再谈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才建立这个问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它自己的特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更替是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渐产生。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公有制，它是不可能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发地产生的，必须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后才能建

立起来，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尽管如此，也不能得出“政治决定经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的结论。因为，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决定政治，经济是本原的，而不是政治决定经济，政治成了本原的。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尖锐矛盾，就既不可能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也不可能在革命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必然发生，不过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由于落后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生产力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同时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迫使人们日益把巨大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时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20页）列宁也曾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64页）

在一定条件下政治对经济的主要的决定作用，不是无条件地起主要的决定作用

马列主义历史唯物论在肯定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承认政治对经济的积极反作用。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

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506 页）

关于政治或国家政权对经济的反作用具体表现怎样，这个问题恩格斯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483 页）这段话对政治和对国家权力的反作用作了充分的估计，但同时指出，国家权力只有在它顺应着经济发展的要求起作用时，它所起的才会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否则就会破坏经济的发展，它所起的就是消极的作用，最终它自身也必然要崩溃。这说明了国家权力的反作用，也还是在经济基础之上发生的。所以，恩格斯还指出：“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506 页）毛主席对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上层建筑的积极反作用这个问题曾作过极其深刻的论述。毛主席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

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300页）这些教导说明了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积极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林彪、“四人帮”为了用历史唯心主义篡改历史唯物主义，在“反作用”问题上大作文章，把毛主席说的“一定条件”偷换成“无条件”，得出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决定性的”这个荒谬的结论。从表现上看，林彪、“四人帮”好象是说政治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实际上，他们所说的“反作用”和马列主义说的“反作用”根本不是一回事。林彪、“四人帮”所说的“反作用”，就是最终决定作用，就是一般地无条件地起决定作用，这种决定作用，不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某一转折点或转折过程，而是它的整个时期。显然，这是在“反作用”的名目下贩运历史唯心主义，并且否定经济是本原的因素，鼓吹政治决定经济。

上面说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内产生，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后，依靠无产阶级政权力量建立起来。这说明政治上层建筑的积极反作用，在这样的条件下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决不能象林彪、“四人帮”那样笼统地说成是“决定性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仍然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比如，在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机关中，混进了象林彪、“四人帮”

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一部分政治权力，这样，被他们控制的政治权力、上层建筑就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粉碎林彪、“四人帮”，不夺回被林彪、“四人帮”篡夺的那部分政治权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仅不能巩固和发展，而且会遭到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也会遭到严重的阻碍。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夺回被林彪、“四人帮”篡夺的那部分政治权力，改变那部分政治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才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毛主席指出：“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300页）

必须指出，政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表现为“决定作用”，同经济基础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是不同的，决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因为经济基础是“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政治上层建筑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起决定作用。而且这种一定的历史条件也是由经济基础发展所造成的，否则是不可能出现这样一定的历史条件的。就是在这一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政治上层建筑变更的方向，也只能适合于、服从于生产关系发展的要求，否则，这种变革本身最后只能是失败而不是成功。可以看出，政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本身就是被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所决定的。林彪、“四人帮”在这样两个决定作用的问题上作文章，颠倒是非，制造混乱，只能暴露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 不是政治脱离经济，不为经济服务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理解政治占首位、政治是统帅的前提和依据。列宁的这个重要的科学论断，不仅包含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来源于经济，而且包含政治反作用于经济，也回答了政治为什么占首位的问题。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就是说，政治是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因为阶级是由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阶级与阶级斗争根源于经济，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根本经济利益是冲突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由对立阶级的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所引起的。可以看出，政治也就是各个阶级之间基于经济利益的阶级斗争。恩格斯指出：“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7页）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作为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集中表现为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怎样才能胜利地夺取政权，只有在党制定的正确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才能取得胜利。因此，也可以说，这时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集中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上。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也必须经过党制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规划等等来表现，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必须集中在这些上面。因为经济的发展，必须要通过

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认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规划来保证，并为经济发展服务。

林彪、“四人帮”在表面上也引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实际上是歪曲了这句话的精神实质而加以引用的，他们只讲政治是“集中表现”，而不讲它是什么的“集中表现”，把政治说成是和经济完全脱离的东西。在他们看来，革命既不是由经济的原因所引起，也不是为了实现经济利益的，把政治说成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凭空出现的东西，从而公然否认经过党和国家集中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是政治。比如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更快地发展国民经济，这本来是无产阶级基本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华主席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可是，林彪、“四人帮”却胡说社会主义建设不是全党、不是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大局，即不是政治问题。又比如，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规划，是和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防御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战略任务紧密相联的。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仅是重大的经济任务，首先是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可是“四人帮”却把“四个现代化”说成是一项经济任务，污蔑搞四个现代化是复辟资本主义。关于“经济方面的政治”“或国家建设的政治”，列宁在许多著作中不断论述过。在一九二〇年底（当时俄国国内战争即将结束），列宁曾指出：“军事战线上的每一个胜利都使我们能抽出力量来从事对内斗争，从事国家建设的政治。我们走向战胜白卫分子的每一步都会使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70页）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他们是

根本不准宣传列宁在这方面的精辟论述的。又比如，在某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还可能直接地表现在某个经济任务的完成上，这时，完成这个任务本身就是政治。如在一九二〇年底，苏联农民和一部分工人由于饥荒等表现出不满情绪，而阶级敌人则利用这一点搞反革命叛乱。在这种情况下，就象列宁所说的：“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70—371页）又如，我国在六十年代初，由于苏修叛徒集团背信弃义，撕毁几百个合同，在经济上封锁我国，使我国造成了许多困难，其中有面临着缺乏石油的严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开发石油，实现石油自给，彻底粉碎苏修的经济封锁，就成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英雄的大庆工人阶级遵循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结束了中国人用“洋油”的历史，高速度地建成了一座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油田，为国家争了光，打击了帝修反，这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吗？可是，林彪、“四人帮”却竭力贬低大庆石油会战的重大政治意义，污蔑大庆是“生产典型”，可以看出，在林彪、“四人帮”看来，政治上层建筑是没有基础的，政治革命是没有客观依据的，集中了的经济也不是政治，这样就彻底否定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马列主义基本观点。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说明了政治不就是经济，而是集中了的经济，它当然比没有集中的分散的局部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更高。所以，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比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总是千方百计地延长劳动

日、压低工人工资来剥削工人，工人阶级展开了为争取缩短劳动日、提高工资的斗争，这是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但是，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不应当忘记：它在这种日常斗争中只是在反对结果，而不是在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只是在阻挠这种下降的趋势，而不是改变这一趋势的方向；只是在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除病根。”“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03—204页）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从根本上得到解放，仅仅满足缩短劳动日、提高工资这样的经济利益那是不可能的，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正如列宁指出的：“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62页）

列宁讲的政治占首位和毛主席讲的政治是统帅，精神是一致的。这并不是说政治是本原的、政治决定经济，而是指出了政治对经济起着统帅作用，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政治对经济的服务作用。如，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经济，就是为无产阶级经济服务，就是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度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总是妄图把经济的发展引向资本主义方向。因此，无产阶级只有紧紧掌握自己的政治统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经济，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计划等